



铜镜铜鉴迷雾起

□李国强 文/图

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

说起铜镜,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”的千古名句,至今这句千古名言仍不失为执政者最好的箴言。除此之外,从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得知,中国古代的镜主要以铜制作,而且主要作用是照容。那么铜镜起源于什么时候?最早的铜镜就是用来照容的吗?

齐家文化铜镜



扫一扫,关注“人文河洛”(renwenheluo)



“若问古今兴废事,请君只看洛阳城。”“人文河洛”系《洛阳日报》品牌之一,让我们在这里触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蕴,感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。

有关铜镜起源的版本很多,客观地看一定是和古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。古代先民在生活生产实践中,可以用眼睛感知自然,感知他人,但是如何才能看到自己呢?正是由于人类认识自己的需要,镜才出现了。

还原一下远古时代先民的生活,先民们从河水中可以观看到自己的容貌,于是慢慢就把盛水的盘作替代物来照自己的容貌。最初的盘是陶制的,那时候盘叫“盥”,或称“盥”,甲骨文已出现这样的字。因盛水为镜,故又称为“水镜”。《尚书·酒诰》上记载“人,无于水盥,当于民盥”,指的就是这种原始的“镜”。

人类是怎样从以水照容过渡到以铜镜照容的?这涉及中国古代铜镜起源。我国专家学者从20世纪就开始进行了相关研究,但成果不多,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中国古代铜镜的源头到底在哪里。回顾我国专家学者的研究,至今为止有以下几种观点。

第一是清代铜镜收藏家梁上椿及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的“铜镜起源于古代铜鉴说”。

他们认为中国古人最先发现静止的水能照见自己的身影,因此发明了用陶鉴(古代泥做的盆)装水,待水面静止以后用来映照人脸或进行梳洗打扮。随着人类进入青铜时代,贵族们开始用铜鉴盛水照容,因为经常擦洗,慢慢地铜鉴底部被擦亮了,有一天贵族偶然发现铜鉴不盛水,底部也能照见人,因此就用不盛水的铜鉴擦亮了照容,慢慢地铜鉴被越做越亮,最后做成铜板状,边上的花纹都做到了铜板的背面,铜镜就发明出来了。

梁上椿在《古镜研究总论》中对铜镜的起源、发展列出一个演变过程:“止水——鉴盆中静水——无水光鉴——光面铜片——铜片背面加钮——素背镜——素地加彩——改绘彩加铸纹——加铸字铭”。

郭沫若也曾有一个推测:“普通人用陶器盛水,贵族用铜器盛水。铜器如果打磨得很洁净,即使无水也是可以鉴容的。故进一步,即由铜水盆扁平化而成镜。铜镜背面有花纹,背心有钮乳,即是盛水铜器扁平化的痕迹。盛水铜器的花纹是在表面的,扁平化后则变成背面了。钮乳是器足的根蒂。”

20世纪中国考古还不发达,因此学者们在没有考古出土物证的情况下,只能依靠逻辑推理和想象来猜想古人的发明。前部分郭沫若先生的推测是合理的,对于后半部分的推测有专家认为尚待商榷。原因是中国最早铜镜的出土时间。

目前考古界发现的最早铜镜距今已4000年,属齐家文化遗存(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800年)。齐家文化考古共出土铜镜两枚,一枚出土于青海省贵南县,另一枚出土在甘肃省广河县。

齐家文化处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末期,青铜制造业尚在萌芽之中。当时,铜器还很少,而且大多是针、锥、耳环之类的小件铜器。铜镜、铜斧已经是当时铸造技术能够铸造的最大的铜器了。

这一时期我国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、马家窑文化、齐家文化、四坝文化、山西陶寺文化、东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出土的早期铜器都是小件铜器,根据当时的铜器铸造

铜镜的起源真相或许有待未来考古工作的新发现来证实。中国古代史书中记载了许多铸造和使用铜镜的传说,我们再从这里来看看铜镜的起源。

《轩辕黄帝传》载:“帝因铸镜以象之,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。”《玄中记》载:“尹寿作镜,尧臣也。”正如炎帝子孙崇敬地把一些发明创造归功于黄帝一样,古人也认为铜镜起源于黄帝。

这些传说虽然不足为凭,但它把我们的探索带到了一个古老的年代,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铜镜的历史悠久。黄帝时期正处在我国原始社会解体的时候,距今约5000年,“尹寿作镜”的传说则要晚一些。

有学者认为我国铜镜起源于战国,文献中曾有记载。《庄子·天道篇》曰:“圣人之心静乎,天地之鉴也,万物之镜也。”《韩非子·观行》亦有:“古之人目短于自见,故以镜观面。”

《战国策·齐策》中还有一个“邹忌讽齐王纳谏”的有趣故事:早晨,邹忌对着镜子整理衣冠,观赏

自己的容颜,然后分别问妻、妾、客人:我长得美还是城北徐公美?妻、妾、客人皆回答是邹公美。邹忌又到镜子前照,观察自己的容颜,又与城北徐公比较,才发现自己确实不如徐公美。邹忌后来想通了:妻子因为爱我,妾因为怕我,客人因有求于我,故皆说我比徐公美。邹忌以这个故事来规劝齐威王应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,其苦口良言终于使齐国富强起来。

这大概是最早的以镜为鉴的故事,从这个故事看出古人对自己容貌仪表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今人,而且能从一面小小的铜镜中照出国之治道,这不由得让今天的我们深深折服。

从古书记载中可以看出铜镜至少到战国晚期已经广泛流行了。当然国内还有一些学者认为,从铜镜流行程度、铸造技术、艺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,铜镜的流行始于汉,因为汉镜不仅出土量大,而且实物精美,800多年前编撰的《宣和博古图》中收录了113面铜镜,皆列于汉唐两代。

道德坊: 安乐窝原址在此 邵夫子名扬千秋

道德坊位于定鼎门东第四大街从南向北数第七坊,遗址在现在的洛河河道上。公元1062年,安贫乐道的宋代理学家邵雍在西京(洛阳)留守王拱辰的帮助下,移居该坊,有了大名鼎鼎的安乐窝。

安贫乐道究天理

邵雍,祖籍范阳(今河北涿州),北宋著名的理学家、教育家,与张载、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并称北宋“五子”。市文物局副局长吴迪介绍,少年时代的邵雍就胸怀大志,刻苦读书,“于书无所不读。始为学,即刻苦刻厉,寒不炉,暑不扇,夜不就席者数年”。之后,学业精进的邵雍想到古人崇尚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于是决定外出游历,他越黄河,过汾河,涉淮水、渡汉水,到过齐、鲁、宋、郑等各地。1041年,30岁的邵雍游历西京洛阳,一下子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。1049年春,邵雍举家迁居洛阳。当时,邵雍以先天之学、观物之学、历史之学、性命之学为核心构筑的理学体系已有雏形。

定居洛阳之初,邵雍一家住在城东北云溪观的土窑洞内,“外无强近之亲,内无应门之童”,家徒四壁,生活困顿,自己打柴做饭侍奉双亲。

虽然物质生活清苦,但邵雍安贫乐道,不露戚容,读书耕种、讲学交友,平和淡定,说自己“夏居长生洞,冬居安乐窝”“窃料人间乐,无如吾最多”。

吴迪说,邵雍到洛阳后,就拜访天官寺住持宝月大师,他的博学让宝月大师很为震惊,当即称他为“邵子”,请其入住天官寺三学院设馆授徒。经宝月大师的推荐,洛阳学子刘君玉、吕静居、张师锡、张景伯等人,先后入天官寺,成为邵雍的门生。

朋友相助建宅院

公元1062年年初,王拱辰任西京留守,刚上任,就去拜访在家守制的宰相富弼,并前往天官寺看望邵雍。

得知邵雍生活艰难但安贫乐道,王拱辰十分敬仰,就组织官府工匠,在天官寺西侧的荒地上,也就是隋唐里坊区的道德坊内,利用天官寺存放的建材,建了三十间房子,请邵雍居住。

这种官府所属、居民可低价租赁或免费使用的房子,就相当于现在的廉租房,房子的南侧有一个大花园,也一并交给邵雍使用,形成一个很大的宅园,邵雍将其命名为安乐窝。

可惜好景不长。王安石推行官田官宅法,凡是非官府占用的官田官宅,一律卖掉。安乐窝就是这样的性质,当时的执法人员要求邵雍立即搬家。

王拱辰得知后,让其子王正甫联络了富弼、司马光等二十余家集钱买下了安乐窝宅院,赠给了邵雍。

新址旧名“安乐窝”

写到这里,估计会有读者疑惑了,邵雍宅院“安乐窝”不是在现在的洛龙区安乐镇的安乐窝村吗?今天的位置应为过去的旌善坊,距离道德坊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,这是怎么回事?

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商春芳解释,安乐窝原址在道德坊,现在已经是洛河河床了,现在的邵雍故居在旌善坊,距离原址1650米,大约有两坊之远。

商春芳介绍,公元1077年,邵雍于安乐窝去世。北宋末年,道德坊的安乐窝被金兵焚毁,后人思慕邵雍遗风,追寻原址不得,就在天津桥南重设邵雍祠堂而祀之。清代道光年间,祠堂被洪水冲毁,就易地目前的龙门大道东侧安乐窝建邵雍故居。

“今天龙门大道东侧安乐窝村的邵雍故居,是公元1839年由洛阳知县马恕建造的,当时只修建了山门和邵子祠、启贤祠,并从原十贤祠移来了部分石碑,规模很小。民国初年,吴佩孚驻洛,增建了皇极阁和厢房,形成现在的规模,它与宋代的安乐窝有继承关系。”商春芳说。

(感谢市文物局、市隋唐史学会对本栏目的支持) 本报记者 常书香



新安古渡今何在

□李根柱

一 西沃渡口称天险

黄河自河南、山西、陕西三省交界处的风陵渡由南下折而向东,进入洛阳后沿途著名渡口有数十处,如西沃渡口、狂口渡口、盐仓渡口等。历史上这些渡口曾经辉煌过,如今有些已经淹没在水库之下,有些则还能行船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黄河新安县段的著名古渡。

黄河进入新安县境内的主要渡口有麻峪渡口、塔地渡口、石渠渡口、西沃渡口、狂口渡口、盐仓渡口等。西沃渡口,位于河南新安县西沃村与济源县北长泉村之间,是黄河“八里胡同”峡谷段出口。

历史上的西沃渡口长期是黄河航运的码头。公元前279年,赵惠文王赴魏池与秦昭王会盟,自西沃渡口过黄河。明崇祯十七年(公元1644年),高迎祥、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从西沃渡口进入陕西,直逼洛阳。

1989年版《新安县志·军事编·第二章》记载:“黄河渡口,包括石渠、塔地、西沃、狂口等古渡口,为晋南、豫北与豫西间的重要通道,古称天险,历来有重兵驻守。明末李自成起义军,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下支队、豫西支队,及解放战争中的陈赓兵团等,都曾由新安北境突破黄河天险,进军豫西或中原。”

二 天限狂澜狂口渡

狂口村地处洛阳市新安县以北的黄河南岸,黄河在狂口村北横贯东西,狂口村东的畛河纵贯南北汇入黄河。1989年版《新安县志·地理编》记载:“狂口,在县城东北27千米黄河南岸,为黄河古渡口,今属仓头乡。旧志载:明嘉靖二十二年(公元1543年),都御史李宗枢在此建城垣,南北二门俱题其额曰:天限狂澜。故又名狂澜镇。又因黄河水至此旋转涡流东去,故俗称东沃,与西沃相呼应。”

三 盐仓盐东有古仓

盐仓渡口的盐仓,是国家贮存食盐的仓库。盐仓村位于伸入黄河中的一个半岛上,半岛海拔高度442米,高出小浪底库区最高水位160余米。汉代曾在盐仓村设立规模宏大的国家黄河漕运仓库。黄河东边有西汉漕运仓遗址,遗址位于新安县仓头乡盐东村,黄河南岸二级台地上有西汉漕运

滚而下,冲击巨石,浪起数丈,水势凶猛,涛声如雷,人称此处为老龙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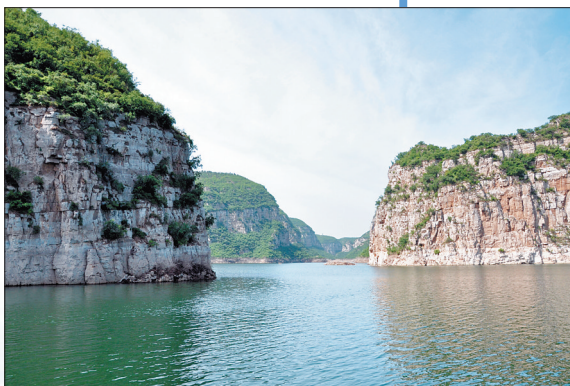
狂口,上承山西壶口、河津龙门口;下启小浪底孟津口,处在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上的重要位置。狂口村的田地里,曾发掘出大量仰韶文化时期的石器、灰陶、彩陶。早在汉末,官方在狂口设粮仓、盐仓,今新安县仓头、盐西、盐东等村,皆由此得名。

清代乾隆年间,为了平定金川叛乱,朝廷供应前方作战部队粮食辎重,乾隆皇帝曾派朝臣徐潮专程到新安狂口、滹池卧虎滩、陕县太阳渡等处沿黄河行船试水,拟重新开辟黄河漕运,因沿河纤道废弃,找不到熟练船工,只好改由陆运。

仓遗址。盐东遗址1988年被发掘,是首次发现西汉漕运仓遗址,出土了大量汉代泥质板瓦、筒瓦、瓦当残片,其纹饰有粗绳纹、细绳纹、内菱纹、布纹等。部分瓦片上刻有繁体“关”字。此外,还出土了一枚汉代五铢钱。此次发掘对研究黄河漕运的有关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。



鸟瞰黄河故道 杨光瑞摄



黄河八里胡同 杨光瑞摄